



舒大刚学术论著集之一

儒藏论衡

经典儒学与大众儒学

舒大刚 著 马 琛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舒大刚学术论著集之一

儒藏论衡

经典儒学与大众儒学

舒大刚 著 马 琛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藏论衡：经典儒学与大众儒学 / 舒大刚著；马
琛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325-8789-6

I. ①儒… II. ①舒… ②马… III. ①儒家—文集
IV. ①B2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7199 号

儒藏论衡：经典儒学与大众儒学

舒大刚 著

马 琛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75 插页 2 字数 475,000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789-6

B·1050 定价：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自序

这里选编的是笔者学习经典、编纂《儒藏》、研讨儒学的几篇小文，共30篇，分成四组：

第一组“《儒藏》论衡”6篇，包括《儒藏》总序、《儒藏》发轫、《儒藏》体例，以及编纂《儒藏》论部和史部的分类等问题。四川大学上承文翁石室之遗泽，下继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之传统，经始《儒藏》，谋于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于1997年。面对《儒藏》编纂这个浩大工程，一开始必然涉及如何编、如何借鉴已有成果等问题。我在《〈儒藏〉总序》和《谈谈〈儒藏〉编纂的分类问题》中，通览了历代文献著录，特别是儒学文献整理的历史，发现无论是目录书的编撰，或是大型丛书的编定，在方法上都是既有继承（如“四部”分类之于百科文献），也有创新（如《佛》《道》二藏等专科文献），而其成功的分类则在于因应当时文献的具体实际，适应学术研究的普遍需求，甚而引领未来学术之发展，来进行正确的抉择或适时的创新。于是我们提出了以“三藏二十四目”（即经藏：元典、易、书、诗、礼、春秋、孝经、四书、群经、小学、讖纬；论藏：儒家、性理、政论、礼教、杂论；史藏：孔孟、学案、碑传、年谱、史传、学校、礼乐、杂史）来分类编纂《儒藏》的设想。在稽考儒学丛书编纂的历史进程时，我们发现历史上第一个从事《儒藏》编纂的人，并不是人们普遍称道的明末人曹学佺，而是明万历中期孙羽侯（字鹏初，华容人），汤显祖称赞他是“通博伟丽之儒”，曾经“櫟括《十三经注疏》，以为《儒藏》”。孙羽侯（1556—1617），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在朝为官，万历二十三年被黜还乡；曹学佺（1574—1646）于是年（万历二十三年，1595）始第进士，至明末始编《儒藏》，历十余年，未成而明亡，殉难遂辍。如此算来，孙氏编《儒藏》要比曹学佺早20余年。

第二组“经学丛考”9篇，中国文化的主干是儒学，儒学的根基则是经学，经典和经学是中国儒学的源头活水。但是学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却认识模糊，如经典体系如何构建，“十三经”何时形成，以及“乐经”亡逸，“逸礼”归宿，《孝经》得名和成书，古《周易》的分篇和结构，经学盛世时期——两汉儒学文献的状况等问题，都众说纷纭，难定是非。在这一组文章中，笔者重点探讨“蜀石经”之于“十三经”结集和形成的决定性作用；《孝经》得名于原始《孝经》首章或次章首句的主题词（“夫孝天之经”）；《乐经》不亡于秦火而湮没于被改头换面的宫乐之中；《逸礼》并未完全消

亡；《周易》经传在郑玄和王弼混合后，其原貌在宋儒复古运动的努力下逐渐得到复原；揭示了在“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嬗变、“师法”“家法”消长的影响下，文献形式上由“传”“记”向“章句”“笺”“注”的转移过程；还对久违的东坡经学三书（《易传》《书传》《论语说》）的著述、流传和辑存情况，进行了探索。

第三组“儒史钩沉”9篇，涉及儒家信仰、孔子教育、荀学核心、《易》墨义利、王弼师承，以及蜀学重镇“文翁石室”的祭祀体系，为学善变的廖平之文献整理与“第三变”变因探讨等问题。据考察，孔子总结夏、商、周文化传统而形成的天命观、鬼神观、礼乐观所体现出来的敬天法祖、文明理性精神，恰恰构成了中国人数千年的信仰体系；孔子在教育上重视“全能”（六艺）、“全智”（六经）、“全德”（君子）的“三全”方法，以及以“安天下”（经邦济世）、“安魂”（讲信仰）为目的的“两安”教育模式，其重要性比之人们所艳称的“启发式”“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等教育理念，一点也不逊色。至于儒者倡义以及利、墨者以利而为义等思想方法和理论阐述，常常造成了“儒者重义”“墨者重利”的印象，则是对孔子和墨子的极大误会。远在西南的巴蜀地区，自汉景帝末年文翁开设石室学官，传授儒家“七经”，从而开启了地方政府办学传授儒学的先河；东汉后期蜀守高颐修复石室，新起周公礼殿，彩绘历代圣贤名流画像以供祭祀，形成庞大祭祀体系，正式形成“庙学合一”体制，实现了知识殿堂和精神家园的一体化，这一制度领先中原王朝300年。至于“王弼传郑学”以及廖平受张之洞“贿逼改说”等观点，经笔者考察发现：查无实据，无非故实。此外，为继承和弘扬近世学术传统，本人还与同道及师门合作，编纂整理出版了《廖平全集》和《金景芳全集》，其整理价值与学术内涵，则分别在二书的序言中有所反映。

第四组“当代儒学”6篇，主要探讨儒学在当代的运用和未来出路问题，重点有三：一是恢复民国初年被废除、“文革”时被重点批判的“经学”（或儒学）学科，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探讨。二是儒学在当代和未来如何重获学术生命力，实现其淑世济人的价值？三是儒学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或者说国学的主体内涵是什么？对于前者，我们发现，儒学具有独立的经典体系、学术体系、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也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成果和庞大的文献，其历史积累和文化积淀都十分丰厚，近代废除“经学”学科是儒学遭受重创和支离，使中华文化缺乏自信、被阉割自新活力的重要原因。今天要培养出合格的儒学人才，促进儒学的当代创新和发展，就必须恢复儒学学科，推行系统的儒学教育。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为了促进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当实施“经典儒学”与“大众儒学”双轨并进、协调发展的路子，以经典儒学来加强儒学的学术创新，产生传世精品；以大众儒学

来推动儒学的应用发展,提升其淑世价值。对于第三个问题,我们认为,“国学”无疑是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但也十分庞杂、五花八门,今天讲好“国学”,就要突出其信仰体系(如儒释道)和价值体系(如忠质文、三统)、知识体系(如四部、六略、六经、七学等)和特殊技能(如六艺、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道德体系(如五常、八德等)和行为规范(如十义、礼仪文明、君子风范等),是即“三体六面”。归根结蒂,讲论“国学”还是要将儒学价值和内涵讲清楚,因为儒学是国学的主干。

最后还附录有《国学经典价值与高校通识教育》,则是2016年夏,我应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之邀,与朱汉民、颜炳罡,共同为于建福教授主持的“全国高校校长、党委书记(或副校长、副书记)经典与大学素质教育培训班”会讲时的录音整理。因其基本代表我们几位关于经典价值的观点,对当下大学教育还有参考价值,故亦附录于兹,以广其传。

四个部分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儒藏》论衡”反映了近20年我们所从事的主体工作的状况,其他研究都是在为其奠基、开路服务的,有的则是因编《儒藏》而引申开展的。“经学丛考”主要解决儒学文献中主体和源头部分的疑难问题;“儒史钩沉”则是对儒学史上的一些模糊问题进行稽索;“当代儒学”则思考儒学在当代和未来的发展与应用问题。虽然比较零碎,倒也互相响应和互为补充,同时也应验了我们提倡的“经典儒学”(儒藏、经学、儒学史)与“大众儒学”(当代儒学)双轨并进的思路。职是之故,本论集即以“儒藏论衡”命名,而以“经典儒学与大众儒学”副之可矣!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收集和整理本论集是由我们《儒藏》助理马琛硕士完成的!是她帮我选目,然后一篇一篇地甄别沙汰,删重去复;再录入校勘,审定引文。一件一件,一桩一桩,都做得很仔细认真。马琛还为每一组文章写了“导语”,以便读者入门了解,是她帮助我实现了文章的自我反省。在这里,我必须要向她说一声“谢谢”!

至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先生、总编辑吕健先生,在得知我有总结整理文集之后,慨然同意出版,并安排得力编辑人员,帮我完成编校工作,使之在不长的时间内得以面世,更是我应当深致谢意的!

舒大刚

2018年元宵夜,记于成都川大花园寓所

目录

- 001 自序

儒藏论衡

- 003 《儒藏》总序
——论儒学文献整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015 谁是中华《儒藏》编纂的第一人
——湖湘学人孙羽侯
- 018 谈谈《儒藏》编纂的分类问题
- 032 试论《儒藏》“论部”的分类方法
- 046 论《儒藏》“史部”的分类问题
- 054 继承蜀学传统,整理儒学文献
——四川大学《儒藏》编纂纪事

经学丛考

- 061 “十三经”:儒家经典体系形成的历史考察
- 075 “蜀石经”与“十三经”的结集
- 085 试析宋代“古《易》五家”在恢复古《周易》上的重要成就
- 104 《周易》复卦卦辞“七日来复”新论
- 117 “《乐经》亡于秦火”辨析

- 125 逸礼考略
- 140 《孝经》名义考
——兼及《孝经》的成书时代
- 153 汉代儒学文献的发展与演变
- 173 苏东坡“经学”三书提要

儒史钩沉

- 185 孔子“三统”：中华民族信仰略论
- 201 孔子的教育思想
- 218 《易》墨的“义利观”略论
- 230 仁义·礼乐·忠信：荀子求实的
价值观
- 239 “王弼传郑学”驳议
- 248 “庙学合一”的创举：成都石室学
宫“周公礼殿”考
- 279 《廖平全集》总序
- 298 龚道耕学术成就刍议
- 320 金景芳先生生平与学术简论
——《金景芳全集》序

当代儒学

- 339 重建儒学学科 提高文化自觉
- 345 “经典儒学”与“大众儒学”
——儒学当代复兴之路
- 356 孔子儒学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
- 358 实现“中国梦”的传统途径
- 370 中华“国学”体系构建议
- 385 谈谈儒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390 附录：国学经典价值与高校通识教育

儒藏论衡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自汉武帝以下曾被历代统治者推为「独尊」的国家学术和民族信仰，与佛教、道教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但是，儒学却没有像佛、道之《大藏经》《道藏》那样拥有一部自己的大型丛书。历经明代孙羽侯、曹学佺，清代周永年倡导，汇集两千五百余年的儒学成果编成一部大型《儒藏》，一直是数百年来中华学人一大梦想。二十世纪末，率先发起《儒藏》编纂的四川大学，终于将此事正式提上日程。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相继开始《儒藏》编纂。《儒藏》一度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报刊、网络纷纷予以讨论。

本章收录作者结合《儒藏》编纂实践，从二十一世纪初陆续发表的《儒藏》系列论文，其中既论述了编纂《儒藏》的宗旨和意义，又针对目录分类、具体编纂体例等提出建设性方案。文中提出「三藏二十四目」的编纂体例，采用「影印加点校」「叙录加提要」等方式，在图书分类、经典导览、学术叙事、内容点评等方面，皆较新创意，已成儒学「南藏」的代表而广为学界认可。

《儒藏》总序

——论儒学文献整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儒藏》是有关儒学成果及其史料的大型丛书。它荟萃两千余年儒学著作,以系统的著录体例,分门别类地予以整理、校勘和编排。它作为中国古代儒学成就之集成,可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与《大藏经》《道藏》鼎足而三,永远滋养中华民族的心灵,并且代表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今值《儒藏》出版之际,聊述因缘,以弁篇首。

一

儒学是中国的。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的孔子集唐、虞、夏、商、周优秀文化之大成,总《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树“仁义”“忠信”之高标,垂“中庸”“忠恕”之宏法,创立儒学,垂教万世。儒学生于斯,长于斯,昌盛于斯,亦曾一度衰微于斯。两千多年来,儒学是引道中国文化走向辉煌的指南北斗,是铸造中国文化特质的规矩准绳。它是中国文化之门、中国文化之蕴,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学术和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促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灵魂。在国际范围内,人们一提起中国文化,首先想到的无疑就是孔子,就是他所创立的儒学。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是中国的,中国也是儒学的。要深入研究中国文化,欲准确地了解中国历史,不认识孔夫子,不研究儒学,就不能得其门而入,更不能得其精华和神韵!

儒学是东方的。古代东方,北起朝鲜半岛,东至日本列岛,南到印支半岛、南亚诸国,伴随着儒家“偃武修文”“睦近徠远”外交方略的实施,东亚各国“成均馆”(朝鲜)、“大学寮”(日本)、“国子监”和“国学院”(越南)等文教机构的设置,大批“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的派遣,儒学早已融入东方历史和社会,成为东方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同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的重要部分;东方各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化

学者,或用儒学治世,或以儒理明志,与中华学人一道共同丰富和发展了儒学的思想和内涵。因此,国际“汉学界”在讨论东方社会时,无不异口同声地称之为“儒家文化圈”。崇尚“仁义礼乐”的儒家思想成了东亚各国共同标榜的文化理想。

儒学又是世界的。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的文化主流,儒学不仅影响了东方,而且辐射世界。就古代而言,先秦儒学是西方学者公认的世界上古文化“轴心时代”的主流思想,是古代东方思想文化的源头活水。儒学是开放性的,在历史发展演进的长河中,儒学不断以其“海纳百川”“集杂为醇”的包容精神,融合涵摄了各种外来文化与文明,与时偕行,日新其德,使思想之源长盛,学术之树常青。儒学在历史上不断兼容并包各家学术、进行自我创新的历史,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不断创造发明的历史,是人类文化宝库日新月异、充实丰富的历史,也是儒学不断影响和辐射世界的历史。她的经典和理论曾西涉流沙,南渡重洋,对近代思想启蒙和现代文明的形成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她又作为十三亿中国人及数千万海外华人和侨胞共同的文化符号和背景,卓尔屹立于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倡导“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平共处原则,以其“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情怀,化解各种矛盾,调停地区冲突。

儒学是历史的。在儒术盛行的时代,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学术,而且几乎是中国学术的古代,它与古代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结下了不解之缘。殷墟甲骨文有“儒”与“丘儒”之官,《周礼》有“师儒”之职,儒者在殷商时期就已发挥着重要作用。至春秋时期,孔子正式创立具有系统思想和文化特征的儒家学派,孔门弟子散游四方,友教诸侯和士大夫,“六艺”之学风行天下,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智慧,催生了诸子学派,促成了百家争鸣。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儒学,就没有诸子百家,也没有周秦学术。继而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家经典教育与研究影响了中国两千余年的教育、选举和文化。可以说,中国的古代史主要就是儒学影响中国的历史。没有儒学,便没有古代中国的教育,也就没有古代中国的学术,也就不会有如此灿烂的中国文化。人类不可能生活在没有历史的真空之中,对于逝去的昨天,对于先贤的遗产,我们应该以回顾、反观、总结与传承的态度,在历史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用富有民族特色的创新来丰富历史、美化生活。作为与中国历史水乳交融的儒学,当然不能游离于历史继承之外,更不会自外于伟大的文化创新。

儒学又是现实的。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文化大国,它的“古”不仅在于历史上曾经有过,更在于其历史传统一直在延续着;它的“大”不仅在于文化积累丰富,更在于其优秀文化一直在弘扬光大着。由殷可以见夏,由周可以观殷。后世之

“继周者”，有秦、汉、晋、唐、宋、元、明、清，其民族则有华夏、“四裔”，汉族、少数民族。然而，只要是在华夏文化圈内崛起，只要是在中华大地上立国，无论愿意不愿意，主动或被动，都必然打上儒学文化这个不朽的烙印。纵观古今历史，无一例外。即使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必将被中原固有文化所融合甚至同化。如果说，在春秋战国时期还存在“以夏变夷”和“以夷变夏”的争论，那么自秦汉以后的中国，无论谁来当皇帝坐天下，都毫无例外将进行以“华化”“汉化”为主流的多民族融合。“五胡十六国”是这样，辽、金是这样，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也不例外，满族建立的清朝更是如此。其原因也许多种多样，但其中以儒学为主体的华夏文化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代表了各族文化发展的共同方向，则是最深层的原因。特别是儒家从理论上将这一文化总结出来，建立起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体系，形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隋、唐等“正统”观念，并从教育上、实践中宣传和推广开来，从而形成了以儒学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尽管有些观念在今天已显得陈腐和落后，但它是千百年来维系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更是激起“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豪情的潜在动力。今天，即使我们已经跨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瞬息万变、不可捉摸的世界局势，曾使传统文化被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社会和多元化（甚至诡异化）的思想所困厄，以至于一些人曾一度产生过摆脱文化传统“束缚”的想法。然而事实反复证明，文化传统是无法摆脱的，儒学对新世纪、新世界的作用和影响仍然是不可低估、不容忽视的。它已呈现出与日俱增、历久弥新之势。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也将焕然一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既有的价值观念正在得到重新审视和认同，儒学这一古老学科必将焕发绚丽的青春，儒家思想也将一如既往地作用于当今的世界。否则，20世纪80年代末，一百余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讨论“面向二十一世纪”问题时，怎会发出“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的呼声？2004年8月，来自世界各地的两百余位专家学者齐集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参加“第一届儒学国际大会”，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学者深入讨论了儒学各类理念后，形成了《吉隆坡宣言》，宣称儒家“‘忠恕之道’是促进世界和平、物我相谐的基石”，提议“正式启动‘以儒学救世’的机运，缔造二十一世纪儒学另一个国际化的新局面”！

儒学是理论的。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学术集群，儒学是一个丰富的思想体系，它集哲学、政治、伦理、社会、教育以及其他文化思想观念为一体，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其“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周易·系辞传》）的命题，构成了中国人的宇宙图式 and 世界观。“过犹不及”“中正”“中

庸”(孔子)的辩证思维,形成了中国人高超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仁义礼智信”(孔子、孟子、董仲舒)的五常之教,成了中国人做“新民”、立“新德”(《大学》)的指导思想。追求和平、讲究秩序的理论,成了中国人建立和谐社会、实现文明生活的理想模式。“载舟覆舟”(孔子)的君民关系论和“民贵君轻”(孟子)的“民本”思想,成了历代志士仁人反对专制集权、追求“仁政德治”的思想武器。“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进德修业”(《周易》)、“内圣外王”(庄子)的修身模式,构成了中国人终身向往的理想人格和修身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忠恕”情怀,成为中国人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无上法则。这一切的一切,都经儒家的提倡、推广,逐渐融入了中国的民族精神之中,支撑着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衍,创造和丰富着自己灿烂的文化和文明。儒家经典是中国思想的源头活水,儒家理论是中华精神的思想宝库。我们只要不愿重过“从人到猿”的生活,当然就不会拒绝这份珍贵遗产的滋润。

儒学尤其是实践的。儒家“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是修身之学、实践之学,伦理道德学说构成了儒家学说的核心和灵魂。儒家重视思想教育,注重个性修养和道德情操,提倡“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以天下为己任”,强调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它虽然上究“天人”之际,下探“心性”之微,形上无象,玄之又玄,但在讲究“博学”“慎思”的同时,又特别强调“笃行”。它的“仁”便是要“爱人”,“义”便是要行而得宜,“礼”本身就是行为规范,“智”便是要知晓“仁义”之道而慎守弗失(孟子),“信”便是要言而行之(孔子)。儒家非常重视“五伦”教育,将其定义为人伦之始、政治之本。“五品”之教首倡于尧舜之《典》,“五教”之义复申于《左传》《孟子》,至《中庸》更将其奉为“天下之达道”。在儒家看来,五伦不顺,将伦理倒错,人将不人;五教推行,则社会和谐,政治清明。儒家成功地将个人的品德修养与国家的治理安定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与社会的道德感化力量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使道德规范的约束功能与知耻自觉的自律机制更好地相辅相成。《大学》之书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定义为修“大道”、闻“大义”的“三纲领”“八条目”,设为儒者奉行不二的大纲大法,更是儒家力行躬践哲学的集中体现。儒学正是以其理论与实践结合、个体修养与群体利益结合、道德修养与政治事业结合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义道德”“孝悌忠信”“民胞物与”“崇德广业”“诚实守信”“见义勇为”“文明理性”“公平正直”“礼义廉耻”等优秀品德,这是它有别于宗教神学的根本之处。

总之,儒学作为历经两千五百余年发展的系统理论,已成为中华文化的血脉和灵魂,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和精神财富。它既是中国的,也是东方的和世界的;既

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尽管儒学作为古代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也存在不太适应现代社会的内容,特别是经两千年间专制君主的利用与歪曲,使它带上了许多旧时代的特征。但是,我们无论是要认识中国,还是要研究世界;无论是要回顾历史,还是要服务现实;无论是要探讨理论,还是要躬行实践,在古今中外学术中,儒学都应位居首选,理当认真研究和弘扬。这就是它在历经了无数风风雨雨、艰难磨砺之后,仍能像凤凰涅槃一般不断获得新生的缘由所在。儒学在今天即使已经失去了从前“塞乎天地,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放诸四海而无不准”(曾参)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地位,但若要认真地研究和认识中国,特别是中国人面对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局面,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重建人类文化新秩序,我们检点一下自己的文化库存,并衡之古今中外的价值标准,除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优秀传统文化外,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西学东渐”大潮下的“中学”迷失,“疑古过勇”“文化革命”带来的文化虚无主义,以至于“儒学在哪里”“儒学为何物”“儒学研究从何着手”之类不该存在的问题,在儒学诞生之地的中国却成了“严重问题”。儒家著作或灭于劫灰,或毁于人祸,或流失于重洋之外。其所存者,亦分散于群籍,杂厕于四部,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人们常常会感到:要研究孔子而不知孔子资料何在,欲研究儒学却不见儒学文献全貌,欲研究经学却不知何经可信、何书可读。至于在汲取已有儒学与经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研究,则大有所措手足之感。究其原因,皆在于近百年儒学传统的丢失,尤在于儒学迄今未有一部自己的文献集成。要摆脱儒学研究的这一隔世感与陌生感,确立儒学的本位意识,认真搜集和整理儒学文献,建构完备的儒学文献库,就是十分必要的和迫切需要的了。前人为矫“心学”末流“束书不观”之弊,而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今天要纠正“疑古过勇”“文化革命”造成的文化虚无之失,我们也不得不重申“舍文献无儒术”了。这就是我们提倡编纂大型儒学丛书——《儒藏》的原因所在。

二

在中国学术史上有所谓“三教九流”之称,“三教”即儒、释、道,“九流”即诸子百

家。佛教的文献已经有中外各种版别的《大藏经》收集，道教文献也有古今诸本《道藏》汇录，就连分量并不庞大的诸子著作，也有《百子全书》《诸子集成》系列来结集。可是迄今为止，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却没有像佛、道、诸子那样，拥有自己涵盖全面的大型丛书。

通观中国历史，每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复兴无不是伴随着对前代文献的全面搜集和整理而出现的。《隋书·经籍志序》曰：“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历史已经昭示，儒学的创立和战国的学术繁荣是以孔子删订“六经”为契机；西汉的经学初成与文化复苏是以“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政策的实施为先道；东汉的经学与文学、史学的繁盛是以西汉末年向、歆父子校书为基础。同样，隋大业间广泛的收集图书和初唐的整理图籍，奠定了大唐文明的基石；北宋初广泛的文献整理，揭开了中国文化高峰“宋代文化”的序幕；清朝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等大型文献修纂工程的实施，直接促成了以“乾嘉之学”为代表的“清学”的形成。文献是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载体，资料更是从事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文献学和史料学正是保障文献、史料得以科学利用和有效推广的“先行官”。儒学要在新世纪得到发展和复兴，重返淑世济人之路，对其以文献为载体的成果进行彻底清理和合理继承，便是先决条件。可惜的是，大规模地搜集和整理儒学文献，并编制成大型儒学丛书，历史上虽屡有倡议，却始终没能实现，甚至专门而系统的儒学文献著录体系也未曾确立。这对于以儒立国、以儒治世的中国而言，无疑是莫大的遗憾。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又在《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庄子·天运篇》和《天道篇》也有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文”和孔子“繙十二经以说”的记载。说明孔子是将古典文献整理出来，形成“六经”或“十二经”概念的第一人。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群书，编成《别录》《七略》，《七略》是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班固据《七略》删成《汉书·艺文志》，其中《六艺略》记录儒家经部图书（按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排列，附史书于《春秋》之后）103家、3123篇；《诸子略》的“儒家类”记录《晏子》《子思》《曾子》以下至《刘向所序》、《扬雄所序》儒学诸子53家、836篇。两类共有儒学文献156种、3959篇，已备儒学文献“经部”“论部”二体。但在整个《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中，儒学文献只占一小部分。